

俯瞰歷史的三峽

◎ 王 毅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大陸的讀者多認為，唐德剛的《晚清七十年》是一部不同於現有程式的史學著作。此書是以港台報刊上通俗連載體文章的風格寫成，因此對於許多讀者，書中的史實應算常識性知識。但就是在淺顯史實後面隨處顯露出的精湛而機智的「史識」，給人以深刻印象。

一 融入了深厚生命感受的歷史觀念

作者與無數國人一樣在近代以來艱難的國運中倍受磨難，而以這種強烈的生命體驗作為觀照歷史的基礎，正是貫穿《晚清七十年》的精神脈絡：

筆者這一代便是不幸地生於這段人不如狗的亂世。跟著時代翻了七八個筋斗，被翻得家破人亡，還不知伊於胡底？幸存海內，哪家沒有一本「難念的經」：偷生海外做「美國人」做「台灣人」，日子也不那麼好過。痛定思痛，生為現時代的中國人，何以一寒至此呢？

長征是像詩人所說的「萬水千山只等閒」那樣輕鬆嗎？或是像革命黨所宣傳的永遠光榮偉大正確嗎？非也。……憶幼年聞長者言，在江西、安徽一帶的國共戰場裡，路上行人走路，要兩手擺動不停。一個人如在野外，……一不小心，就野狗四合，尾隨追逐。因為狗兒有經驗，它們看到背著手的人，以為他就要被槍斃了。它們隨後就可大嚼一餐。……（長征）是英雄們的浪漫詩篇；它卻是黎民小百姓的一部血淚史啊！

按常理，歷史作為對無數人生活歷程的記述，其蘊涵鮮活生命感和深致生命意識本應不言而喻，但實際情況卻未必。因為在源頭上，史學的目的是記述神明和聖王的意志和行為，所以它總是與王權和神權的無限威勢緊緊結合在一起，所以史學長期是統治者的禁臠，史家只能將原本豐富真切的「史實」納入某種神聖的史學「框架」之中；而作為歷史主體的國民及其真實的生命價值和豐富的生命感受，則都變成了這個神聖框架之中僵死的充填物。

相比之下，則只有司馬遷的《報任少卿書》、「太史公曰」、吉本（Edward Gibbon）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序》等屈指可數具有生命意識的史作，才會引起讀者心靈的共鳴和震撼。而《晚清七十年》，則因其充溢的生命活性和對本真歷史的感悟力，差堪稱作是我們久違了的這類史著之一。

二 統領全書的歷史方向感

統領《晚清七十年》的理念，是作者對近代以來中國文化轉型的方向、階段和前景的看法，即「歷史三峽」說：

……在西方文明挑戰之下，我們的傳統制度被迫作有史以來「第二次政治社會制度大轉型」。……這次驚濤駭浪的大轉型，筆者試名之曰「歷史三峽」。我們要通過這個可怕的三峽，大致也要歷時兩百年。……不過不論時間長短，「歷史三峽」終必有通過之一日。這是個歷史的必然。到那時「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我們在喝彩聲中，就可揚帆直下，隨大江東去，進入海闊天空的太平洋了。

在另外的文章中作者更說：

過去五千年的一部中華通史，實是一部「帝王專制史」；而今後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華通史，將是一部「民主政治史」。此一轉變，實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轉者也。這就是吾所謂的歷史的「必然」。（〈半論中共人民政權五十年〉）

基於上述認識，作者既對康梁、孫中山、毛澤東等各種「一次革命論」及其失敗的原因作出了嚴厲而又不乏同情的分析，同時更顯出了與無視我們尚未通過「歷史三峽」這一基本現實的種種說法（如作者老友杜維明所謂「近百餘年來，我們都在向西方學習。現在他們的好東西我們都學會了。他們也該學學我們的好東西了」）之根本歧異。

作者強調要「從巫山之巔，俯瞰三峽中的順流、逆流」，始能了悟「逝者如斯乎，不舍晝夜」：

（中國在鴉片戰爭後）從「千年不變」，忽然地弄得「十年一變」。連變二十變。窮則變、變則通。變它200年，變出一個新的「定型」來。然後它又可以千年不變了。或問：這新的定型是個甚麼模式呢？曰：吾不能確知也。它將是全民族的智慧、經驗和血淚，通過兩百年的「歷史三峽」，慢慢熬出來的。等它熬出來之後，足下自會恍然大悟也。如今我們這個歷史三峽已快到盡頭。

作者做出這樣宏通的俯瞰，不是向世人昭示著登上巫山之巔的魅力嗎？

三 對歷史的「通感」與睿思

錢鍾書先生曾用「通感」形容審美過程中對各種藝術關聯的豁然感悟。其實在史學中，貫通古今的悟性和睿思，也體現著極上的慧因。而《晚清七十年》之「歷史通感」的表現之一，是作者經常隨手點破近代史與當代史之間的各種關聯，比如：

（載漪等四權貴）依附於那權力無邊的西太后裙帶之上，把持了朝政。以最無知的頭腦、最下流的手段，為著最自私的目的，利用一個最樂於暴動的社會基層的群眾組織「義和團」來「扶清滅洋」，奪取政權。他們這一記奪權行為，簡直與66年之後再度發生於北京，利用愛好打砸搶的「紅衛兵」來「興無滅資」、奪權專政，真是前輝後映，歷史重演，如出一轍。

又如評鷺慈禧在近代以來權力四巨頭（慈禧、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中的位置：

她沒有黨派；不搞特務。……沒個甚麼政校、幹校和人民大學，而中央、地方人才鼎盛（所謂中興名臣），……所謂「湘軍」、「淮軍」，實質皆是地方軍閥的胚子。然歷西

后40年之統治，未聞有割據自雄，稱王稱霸也。她毋需楊永泰來為其「削藩」，更沒有個林彪要飛往溫都爾汗……

這類雋語不僅顯出「春秋筆法」的深意，而且作者更以這種一線貫通的理解，穿透了「歷史三峽」複雜紆曲的脈絡。

作為專業史學家，作者的史識更經常通過對重大癥結正面的理禁治亂而顯示出來。比如通過對美國政府大量原始檔案的爬疏，指出了諸多帝國主義國家在近代中國爭奪利益時的矛盾給予當時中國內政外交的複雜影響和機運，尤其在庚子事變的巨大國難之下，是由於美國對自身利益的考慮，才堅持以「門戶開放」代替「列國瓜分」。此結論不僅推翻了「由於義和團『滅洋』勇敢的震懾，帝國主義才被迫打消了瓜分中國的意圖」等流行說法，而且對如何評價洋務派的外交政策、如何評價「群眾運動」等問題提出了新視角。

四 歷史學模式的補充更新

假如將《晚清七十年》與現今許多歷史著作對照，可以真切感到傳統歷史學研究之生命活性的減弱甚至喪失。其表現有二：在常見的「歷史研究」之中，已少有研究者對生命過程的體驗、少有對人性尊嚴的追求和對生命靈感的觸發、感動和解讀。因此它呈現出尷尬的局面：「歷史」原本是由無數生命構成的有聲有色的流程，但是越是經過「學問」的「腌製」，它就越變成了玻璃罩中的木乃伊。而在研究方法上，以往的歷史學也缺乏創新：其目的總是只有一個，就是盡可能細緻地展現某一具體歷史焦點和物像的真實細節。不管動用了多大的成本、或者捨棄了多少局部焦點以外世界豐富的全息性，只要不惜一切地實現了對局部的條分縷析，所謂「歷史研究」的任務就算完成。

上述研究方式難有大的前景是由於：傳統歷史研究提供的信息，主要是為了滿足一種自我循環、自我慰娛的封閉學術體系；但現代社會需要的史實和史識則不同，它除了要為局部知識體系的自我更新提供內在推動之外，更主要的還是要被納入整個社會信息系統的交換和流程。因此它需要更多地具有動態、多維、特別是開放共享等等性質。這種現代特點，要求歷史學具備一種能夠適應這種共享體系的信息「制式」、具備一種能夠向整個社會信息流程比較順暢地輸出知識和思想的「接口」。所以由於這個現代的要求，歷史研究進步的重要內容之一，可能就是「制式」的豐富與革新。

我想，對於《晚清七十年》，讀者固然可以從一般的寫作風格的角度讚歎其行文的個性化、其見解的通達機智……，但是在這些之上更主要的特點，恐怕還在於它與現代社會文化體系具有很強的對接性。因此，不論是在思想穿透性還是在敘述風格上，此書也才可能具有那樣鮮明的生命活力。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2000年10月號總第六十一期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